

陳錫文「三塊地」改革應有序推進

陳錫文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上月宣告進入啟動實施階段，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這「三塊地」的改革成為農地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玉潔

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近日指出，「三塊地」改革要有序推進，必須堅守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這三條底線。

2017年完成改革試點任務

在此輪改革試點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暫時調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有關規定，綜合考慮、合理確定土地徵收補償標準，允許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租賃、入股，下放宅基地行政審批權限等。

陳錫文表示，三年後將對這些試點進行綜合評估，「看這種突破是不是更加符合實際需要，是不是更加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並借此修改現行的法律條款。」

兼顧國家、集體、農民三者利益

陳錫文說，過去徵收農民土地長期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農民土地被徵收後，土地所有權都轉為國有；二是徵收集體土地對農民的補償標準比較低，農民不太滿意。他表示，改革主要在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不改變所有權就進入城鎮建設用地市場，仍歸農民集體所有；另一方面，提高農民徵地補償標準，兼顧國家、集體、

農民三者利益。對於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他強調：「千萬不能認為農村土地可以隨便使用、隨便買賣了。」「入市」有着明確的前置條件和限制條件，只有屬於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如過去的鄉鎮企業用地，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進入城鎮建設用地市場，享受和國有土地同等的權利。

工商資本下鄉種地多虧損

隨着土地確權登記在全國範圍內推開，農村土地流轉加速，工商資本密集「下鄉務農」。針對這一現象，陳錫文指出，企業下鄉規模經營種地虧多盈少，在全世界



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

範圍看都是如此。他解釋道，工商資本進入農業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大型養殖場，單個農民、村委會是搞不起來的，只有與工商企業合作。但是糧食種植沒有實時的、嚴格的檢測標準，僱農缺乏生產動力，因此把成百上千畝土地租來進行公司化生產，很難得到好的收益。同時，企業為了享受補貼，先圈地後搞非農建設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他強調，土地流轉比例應與外出務工農民比例相當，規模經營要順勢而為、以人為本。「我國有5.5億農村勞動力，1.7億到外鄉，大概是30%。現在土地流轉了30%，農村不會出問題，但如果人走了不到三分之一，你把一半土地都弄走了，那剩下的農村勞動力幹嗎去呢？」

委員建言加強青少年責任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曉雪）加強青少年責任感培養，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看，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內在需要的時代課題，從青少年發展的角度看，是幫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實現健康成長發展的迫切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強調，青年是實現「中國夢」的希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

應反思成年人的示範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見右圖）認為，在擔憂青少年責任感缺失的同時，應反思成年人的示範作用。



當前，青少年責任感的培養已引起廣泛關注。多名全國及北京市政協委員日前齊聚全國政協禮堂，合力研討分析社會各界在青少年責任感培養方面的思考、研究成果與實踐智慧。

中國教育被賦予了超高期望

柯楊指出，中國的教育被賦予了超高的期望，而重壓之下不可能有很好的改革。他表示，應重新回歸認識，教育是為了讓人更文明更理性，同時掌握自食其力的本領，更好地服務社會。此外，也要強調教育的成功因素非常複雜，「教育最難的就是你告訴孩子一套東西，社會告訴相反的東西。」

北京市政協委員武力在香港發生「佔中」事件期間親自來過香港。他說，看到那些學生一坐就七八個小時，他們對中國的國情根本沒有正確的認識，「我痛感中國



「少年擔當則中國強」座談會嘉賓合影。

青少年的責任感微弱，中國的教育有很大的缺失。」

缺失正確價值觀教育

北京市政協委員、走進崇高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廖理純（見右圖）表示，中國缺失的是對學生正確價值觀的教育。「當前，從中央到社會各階層對教育都非常重視，此前很多學校通過學習『弟子規』等方式，希望用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來教育後代。但我認為，在尚未搞清楚儒教的精華和糟粕的時候，還是要慎重。」



廖理純指出，理論乃歷史之魂和根，「建立正確的歷史觀和生死觀乃是青少年德育教育的基礎。」

而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馮雙白看來，解決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擔當問題可以更多地從美育的角度入手。

注重轉型期社會環境的影響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芳草國際學校校長劉麗則對青少年社會責任感充滿信心。「河北工業大學發佈的全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平均得分83.09分，顯示我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總體處於較高水平。」

同樣對青少年表示有信心的是全國政協委員金莉（見右圖）。她說，從整體來看，中國的青少年是健康的、積極的、向上的，其社會責任感的缺失存在一定的客觀原因。「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隨着改革開放以及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青年人看到的世界跟我們原先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她認為，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就像一個鏈條，哪一個環

節做得不好，都會影響青少年的整體發展。社會對青年人影響特別大，在強調青年人社會責任感培養的同時，也要加強公民整體社會責任感的培養。

「責任感培養要從家庭餐桌開始」

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楊玉芳（見右圖）認為，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狀況令人喜憂參半。「他們對於人類現狀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但另外一方面又表現出利己主義的傾向。他們對於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感比較強，對於他人的責任感卻比較弱。」



楊玉芳指出，要改善青少年的利己主義現狀，首先讓他們意識到承擔社會責任是必由之路，是實現人生需求的一個最高的層次，個人價值的實現是離不開社會整體發展的。

同時，在操作層面上要鼓勵青少年多參加志願活動，最簡捷的方式就是社區服務，可幫助青少年通過個人實踐和與他人的合作培養社會責任意識。她說：「青少年責任感培養要從家庭的餐桌開始，更需要社會、學校、家庭多方協作。」

教育要以培養人全面發展為目標

八年來堅持為設立全民閱讀日鼓與呼的全國政協委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見右圖）認為，教育最重要的理念是培養一個人，而不是培養一個好成績。教育要以培養人全面發展為目標。他建議，應強調校園的閱讀，為學生留出閱讀時間，同時要善讀書。「青少年多讀書可開眼界，讀好書可立志向，善讀書可明責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也認為，學校應減少課時，減少課業負擔，而這需要教育部門出台相關的制度規定。



四句話概括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與責任

齊鵬飛



專家看香港政改（一）

編者按：應本刊編輯部之邀，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特為本刊撰寫回顧、闡述香港政改進程的文章。本刊自本期起在「專家看香港政改」專欄中陸續刊出。

談香港的「普選」問題，絕不可能僅僅局限於香港本土孤立地就香港「普選」問題來談香港「普選」，而必須將其放置於中央和特區關係的大視野中，放置於「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下，這事實上已經非常明晰地指出了香港「普選」問題的實質。

香港的「普選」問題，事實上是兩個具體問題，即所謂的「雙普選」，一個是行政長官的「普選」，一個是立法會的「普選」。因為行政長官的「普選」已經迫在眉睫，而立法會的「普選」還有一個滯後期。

關於行政長官的「普選」，第一個大的方面是在香港「普選」問題上，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和責任；第二個大

的方面是在香港「普選」問題上，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和責任。本文主要談第一大方面。在此方面，有幾句相互聯繫的話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第一句話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共同構成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的憲制基礎。

第二句話與第一句緊密相聯——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必須以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決定之規定為依歸，必須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決定之規定的基礎上向前推進。

第三句話與前兩句話緊密相聯——對於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中央政府依法享有最高的憲制權力，享有決定權、主導權和監督權。

第四句話與前三句話也緊密相聯——中央政府是推動和落實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的最大民主派——道理也很簡單——中央政府是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的總體方案及其「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設計者、發動者、主導者、推動者和監督者，也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總設計師」、「總工程師」和「總監理師」。而且，中央政府也始終如一地有誠意、有決心、有智慧、有辦法、有能力將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由一紙藍圖轉化為活生生的現實。

以上這四句話，就是在香港「普選」問題上中央政府究竟有什麼樣的憲制地位和責任之具體說明。這四句話不僅在「一國兩制」的理論層面有充分的支撐力，而且在「一國兩制」的實踐層面也有充分的支撐力。